

形象史學研究

2013

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 编



人民出版社

形象史學研究

2013

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 编

 人民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形象史学研究（2013） /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 编.

—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4.4

ISBN 978-7-01-013421-5

I. ①形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文化史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①K20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067773号

形象史学研究（2013）

XINGXIANG SHIXUE YANJIU (2013)

编 者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

责任编辑：陈鹏鸣 杜艳茹

封面设计：赵 晶

出版发行：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：100706

印 刷：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4年4月 第1版

印 次：2014年4月 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：22

字 数：335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01-013421-5

定 价：88.00元

发行电话：(010) 65257256 65245857 65276861

销售中心：(010) 65250042 65273937 65289539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《形象史学研究》编委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卜宪群 王 艺 王 勇 王育成 王震中 孙 晓 扬之水
刘中玉 刘永霞 刘明杉 刘荣军 闫 坤 杨 珍 杨宝玉
张先堂 沈冬梅 周安平 罗世平 赵连赏 胡振宇 郑 岩
柴剑虹 韩丛耀 楼 劲

主 编 刘中玉

副主编 刘明杉 王 艺

前 言

“形象史学”，是指把形与象作为主要材料，用以研究历史的一门学问。

具体来说，指运用传世的岩画、铭刻、造像、器具、建筑、服饰、字画、文书、典籍等一切实物，作为主要证据，并结合文献来综合考察历史的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模式。也许这可以成为继王国维二重证据（传统文献、出土文献）法、第三重证据（口头传播）法之后的一种新的方法。

就历史研究本身来说，我们所说的“形象史学”，不同于艺术史研究中侧重于符号学或阐释学的图像分析法，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图像著录。此外，它与西方史学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“图像证史”也有区别，即不是把历史形象作为唯一的证据运用到历史研究中，而是对形象的生产领域、传播途径、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性的分析，并在此基础上，把形象与传统文献、口头传播等联结起来，构筑一个完整的证据链，藉以探讨中国文化演进的基本脉络。由此来看，“形象史学”既非局限于分析形象本身的文化与历史意义，又超越了传统精英文化史学的范畴，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与拓展性。

就历史研究成果的表述来说，大量有形有图史料的应用，也可以更清晰地阐释研究者的思路与心得；而一般读者，也更容易接受和理解。“形象史学”，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模式的提出，抑或可以将其视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理论体系构建的一次创新，一次尝试。我们希望通过创办《形象史学研究》，来对这一新的研究模式进行不断的探讨和实践，以确定“形象史学”具体的学科范围，构建新的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



目 录

理论探讨

张 弓 从历史图像学到形象史学 / 3

汪 润 社会文化史中的“观”与视觉性——以柯律格（Craig Clunas）《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》为中心 / 10

文物、图像与历史

苏 辉 郑州地区新公布韩国兵器汇录 / 21

朱 浒 “胡人礼佛”模式与汉代佛教图像的本土化进程 / 33

郭文玲 “商山四皓”形象的塑造与演变 / 62

马 怡 从“握卷写”到“伏纸写”——图像所见中国古人的书写姿势及其变迁 / 72

宋艳萍 汉阙与汉代政治史观——汉阙研究之一 / 103

张 总 宗教艺术与传播模式试探——以中古三夷教等为例 / 112

张先堂 史实考索与模拟复原：敦煌莫高窟第61窟供养人画像的史学研究 / 132

陈粟裕 敦煌石窟中佛教圣迹图内容考证 / 142

沈冬梅 《甘露祖师行状》研究 / 161

刘恒武 日本九州现存的宋风石塔——萨摩塔 / 166

向 珊 奇冠异服：杨维禎谪仙形象的雅与俗 / 174

刘明杉 明代文人的砚上题跋 / 187

扬之水 清代金银首饰的名称与样式 / 199

考古、文字与文献

白银市文物局 平川区文化体育和广播影视局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黄湾汉代木椁

墓清理简报 / 237

李 旻 中国考古学景观与卫星图片的利用 / 256

康 鹏 契丹大字《耶律祺墓志铭》补释 / 265

安子毓 《史记》秦代史事辨疑三题 / 272

杨宝玉 敦煌文书P.2942中重要官称所涉历史人物及相关史事考辨 / 286

寇 骞 “儿郎伟”中反映的曹议金征甘州回鹘史实——以敦煌文书P.3270、P.4011

为中心 / 302

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域外汉籍书志（二） / 313

理论探讨

从历史图像学到形象史学

张弓

随着历史学的长足演进，常会涌现出新的学术视角、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。“形象史学”的旨趣在于，将特定的文物图像（含实物）序列当作学术主体，围绕它展开相关研究活动，力求探赜表微，解读这个序列形象中先天包蕴的历史文化意涵。这一崭新的学术主体与学术视角，与其说出自学者群体首倡，不如说出自近数十年来文物考古学、物质文化史的繁荣为历史图像研究揭橥新生面。形象史学的萌生固然有它的合理性，形象史学作为新的学术生长点，如要成长繁荣尚待筚路蓝缕的开拓。

一 传统史学的两大资料序列

传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主要凭借两大类学术资料，一是靠传世和出土文献，二是靠传世和出土的各种图像、实物。这两大资料序列是社会历史演进过程的遗存，是历史的物化载体。撇开这两类历史资料，历史学也就无从谈起。

文献、图像与实物虽然都是历史的遗存，是通向历史学的原生学术“介质”，两类资料的特性又有不同，各自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也不相同。历朝正史、史著、诗文、出土文书等文本文献，一般都具备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等多项历史要素，具有历史的全景性、系统性，属于“显性介质”，是传统史学的主体资料。历代遗址、器物、碑刻、造像、书法、绘画等形象资料，除法书、碑铭、刻辞及少量题记等带有若干历史要素之外，大多只是具象实物，历史要素并不完具。这些具象实物包蕴的文化内涵，往往是意象式“密码”，隐而不彰，属“隐性介质”，须借助文献学或文物考古学给予解析阐释。这类形象资料之于传统史学研究，因而只能是辅助性角色。同样由于这个缘故，我们熟悉的传统史学，往往只须凭借搜集、整理、分析、归纳文献资料，即可以进行学术研究活动；而单一的、散见的图像文物资料，由于它的意象式文化元素有待解析，往往只能起辅助性作用，难以成为史学研究活动的主体。

传统历史学对历史图像（含考古文物图像）资料的整理和运用，概括说来大致见于三种形式：

（1）编纂历史（遗址、文物）图像专题图集。如《中国美术全集》《中国书法全

集》《中国古代货币图录》《南北朝墓志集释》《北朝碑刻题记集成》《古玉器图录》《古印铃图录》《古封泥图录》《汉瓦当图录》《汉画像砖图录》《古琴谱》等；撰写特定历史遗址的考古发掘专题报告、文物图录等。

(2) 编选同历史文本内容相关的文物图像，用作文本附图（插图）。这是历史著作辅以历史图像的通常做法。

(3) 以历史图像为主要内容的学术著作。如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曾实施完成大型科研项目——《中国历史图谱》（张政烺主编，8卷，未刊）。该《图谱》以通史（自先秦至清朝）为纲，按照朝代顺序，依循历朝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划分章节，相应选取编纂相关历史图像（含考古文物图片）；在各朝代、各单元图片之间，配以简要说明性文字。从图、文比例看，巨量历史图片蔚然成为全书主体。尽管如此，由于这些图片是依循通史经纬选取、编纂、简述的，全书仍属通史理路为纲的著作，历史图像没有成为研究活动的主体，还没有进入“形象史学”的领域。书稿名曰《历史图谱》，名副其实，恰如其分。然而应该说，这个课题以历史图像为基本学术“介质”，凭借巨量图像序列的科学编纂与解说，完成通史性学术表述，这一新颖的思路与体例，已经在向“形象史学”的学术旨趣趋近。

二 从历史图像学到形象史学

近数十年来，随着考古学和文物学的长足发展，历史形象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得到极大关注，各种形象资料序列陆续形成。在历史学领域，已然出现以探讨专题序列形象产生的社会（经济、政治、军事）背景、它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元素（含宗教信仰、伦理道德、政治理念）、它的社会功能等为学术宗旨的学术课题。历史形象资料从辅助史料的地位，已然升华为史学研究的主体对象，“形象史学”从传统的历史图像学、考古文物学中脱胎而出，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。

沈从文编著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^[1]可视为形象史学的初期名著。《服饰研究·引言》叙述初衷说，历代正史自《汉书》以下，多有《舆（车）服志》《仪卫志》《郊祀志》《五行志》涉及舆服记载，但“内容重点多限于上层统治者和……官僚集团的朝官朝服”，且“多辗转沿袭，未必见于实用”；涉及舆服的历代“私人著述不下百十种”，却“多近小说家言，或故神其说，或以意附会”，“亦难于落实征信”。在传世文物与出土文物中，同中国历代服饰有关的实物、图像、壁画、墓俑等“宜以百十万计”（材质又分为铜、玉、砖、石、木、漆等）。沈老有鉴于此，遂从含有服饰

[1] 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，1981年9月初版。下文简称《服饰研究》。

图像的历代形象资料中,精选二百帧(组)做为正图、另配一百五十一帧插图;再依循殷商至清的朝代顺序,据图命题,设为一百七十四目(如“一商代墓葬中的玉石陶铜人形”、“七一唐敦煌壁画乐廷瓌夫人行香图”、“一七四清代丝绸”等),逐题(目)探索解析。

关于本书的研究方法,《引言》写道:

(本人)试从常识出发,排比排比材料,采用一个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、综合分析的方法,得到些新的认识理解,根据它提出些新的问题。

“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”,即是图像为主辅以文献,这是贯穿本书的基本研究方法。沈老说此种“方法比较实际”,“是一条比较唯物实事求是的新路”。它不同于基本立足于历史文献的传统研究。“以图像为主”的确定,显示图像资料已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对象。沈老甚且预言,“一部古代物质文化史,还保存得上好于地下”,“综合各部门的发现加以分析研究,所得的知识,也必然将比过去以文献为主的史部学研究方法,开拓了无限广阔的天地。‘文物学’必将成为一种崭新独立科学。”

为探索解析历代服饰演化及其含义,《服饰研究》大量运用历代传世图画中的服饰资料详作比较考索,又博涉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典籍。所引经部如《诗经》《周易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等;所引史部除各正史《舆(车)服志》外,另及《唐六典》《通典》《文献通考》等政书,《太平御览》等类书;所引子部如《庄子》《管子》《法苑珠林》《金刚经鸠异》等;所引集部如《楚辞》及历代诗文集等,共涉古籍约百余种。沈老采用图像与图像、图像与文献进行比较探索与综合分析的研究方法,铸就了全书学术理路的基本格局,也成就了它的学术成果的基本面貌,即对所举图像中服饰具象的样式,细大不捐,力求给予翔实的解说、考订、证实或证伪;对各具象样式间传承演变关系细予考索、发覆。这些原本就是文物图像学关注的学术内容。前揭《引言》表明,编著者本人是将本书看作为一部有别于“史部学”的“文物学”著作的。然而沈老以古代服饰形象序列为研究主体的创意,又是运用传统史学方法,毕竟迈出了从“文物学”到“形象史学”的关键一步。

郭沫若《服饰研究·序言》有如下一段话:

(古代服饰)资料甚多,大可集中研究。于此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各兄弟民族间的相互影响,历代生产方式、阶级关系、风俗习惯、文物制度等,大可一目了然,是绝好的史料。

郭老这段话十分重要。他给服饰资料的“集中研究”提示若干重大的学术路向:通过服饰研究,考察民族文化发展轨迹和各民族文化的互相影响;探讨相关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、阶级关系、风俗习惯、文物制度等。郭老提示的学术路向,不仅对服饰图像研究而且对形象史学、物质文化史研究,都具有指导意义。因为它力求在唯物史观昭

示的更高层次上,界定“形象史学”的学术宗旨,发掘“形象史学”的应有之义。可以设想,历代“以百十万计”的图像和实物所见服饰样式,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意涵,必会以不同形式、从不同角度,直接间接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、阶级关系、风俗习惯、文物制度等各方面,不难从中对应编选相关专题图像序列,分别予以探讨。不过《服饰研究》一书从整体看,似乎没有特意将服饰文化相关的社会(经济、政治、文化)背景研究、服饰文化的政治意涵与社会功能研究等,当作本书主要的学术任务。这由编著者的学术个性所决定。编著者有权依循个人的学术旨趣,为课题编选形象资料并择定学术理路,后人勿须置喙。从学术发展的逻辑前景看,历史图像(实物)资料完全可以转化为史学主体介质,衍生为形象史学新科目。图像学向形象史学的转化大致需具备如下前提:

- (1) 专项形象资料累积足够丰富,它的时代要素、地域要素清晰或基本清晰。
- (2) 专项形象资料的历史文化内涵比较丰富,足以生发主体性研究命题。
- (3) 专项形象研究具备足资参照的历史文献给予证实或证伪。

沈老还著有《龙凤艺术》一书。龙与凤的形象,不仅在古代服饰中分别成为帝后的象征;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玉、石、青铜、金银、髹漆、木雕等古代器物中,龙凤形象的意涵,还有一个从部落、部族、民族图腾到皇权象征的数千年演化过程。不同时期不同形象序列中龙凤形象意涵的演进表明,在华夏文物各形象序列之间,历史文化意涵往往相通。不同形象序列间的意涵会通现象,起初可能属浅层次,逐渐演化为深层次。这种“意涵会通”,可视为各类历史形象中天然蕴含的“中华文化同一性”的呈现。“文化同一性”的存在要求学者:当选定某种形象序列从事研究时,既要致力于这一形象专题的意象内涵解读,又要关注它的文化意象同别类形象之文化意象的内在关联,探讨不同形象序列之间文化意象的同一性;一旦学术条件具备,就即时将专项形象序列研究,提升为多项形象序列的综合研究,进而自觉思考并萃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在各类历史形象的“具象体”中萌生、发展、成熟的样态和轨迹。总而言之,经由专题形象研究向着综合性形象研究的转化与提升,将会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吾华历史文化遗存之万千“具象体”中,天然“内蕴”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、传统文化精神。这该是形象史学研究的根本旨趣,也是衡量形象史学科主体性发育程度的标志。形象史学科主体性得以确立,也就成为同传统历史图像研究、考古文物研究模式相呼应,同传统历史文献研究互补的新的形象史学研究样式。

三 形象史学研究方法论

关于形象史学的研究方法,可以从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角度讨论。因为形象史学既

有同传统史学相通的一面，又有须适应形象（图像）之内涵意象化的特殊性一面。

一般来看，形象史学属于历史学之文化史范畴，历史学普遍遵行的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科学实证方法，同样适用于形象史学研究。在文、史、哲三个学科中，史学研究对科学运用历史资料的倚重，似乎比之文学研究、哲学研究更强烈。史学研究最重科学实证。马克思强调历史学的方法论特征说，历史学“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真正实证的科学”。^{〔1〕}什么叫“真正实证”？就是科学运用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，力求生动描述历史时期人们在社会生活（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化）各领域的种种实践活动，力求准确揭示社会演进各阶段的实际发展过程；同时藉以确认：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绚烂画卷，只有在对历史的文字表述与形象描述中才得以呈现。科学实证思维的方法论，要求历史研究须凭藉真实可信的历史资料立论。如果说文学研究给形象思维、哲学研究给逻辑思维提供了较大空间，史学研究则对缺乏科学实证的想象与推理并不轻易认同。科学实证研究是一切史学的宏观的或微观的论述赖以确立的根基。

曾几何时，所谓“资产阶级实证史学”曾成为含带贬义的专用名词，似乎马克思主义史学可以不要实证。这种提法颇有将实证方法污名化之嫌，应予澄清。历史观与史学方法有联系又有区别；实证方法唯心史观可以用，唯物史观也可以用，区别在于，不同史观的举证，或不免主观随意性，或力求科学严谨。此其一。其二，学术研究、学术传统属于社会上层建筑范畴，某种学术传统一经形成，往往具有相对稳定性，不必然随着社会经济基础以至社会性质的变革而改变。中国历史学的学术传统正是这样。中国历史学发展传统两千多年，包括文本体裁、史家素养、重证据的史学方法等，传承至今，是宝贵的学术文化遗产，应当珍惜爱护、扬弃出新，不应将中国近现代发生的社会变革，简单地同史学发展阶段性强作比附，粗暴否定传统。

特殊地看，形象史学研究缘于图像、文献资料交互为用，亦缘于图像（含实物）内涵的意象式特性，先贤盛倡的传世与出土文献两重实证法，在新的研究实践中发展为多样形式。胪列于下。

（1）运用专题形象序列内多帧图像，对照排比研究，是为自证。

（2）运用历史文献记载，同历史图像（含实物）比较对照，互为证实，互为证伪，互为补充。

（3）不同形象序列之间，相关图像对应互证，互相发明。

（4）采集外域图像，同本土同类图像比较互证。中外对照，观其异同，查其渊源演变，藉以揭示两者间的历史文化因缘，及本土形象（含实物）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，深化对本土形象内涵的参悟认知。

〔1〕马克思：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，见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3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60年第1版，第30页。

同时还须注意,形象史学的某些图像(文物)资料,往往蕴含史前文化意象、或蕴含元典精神意象、或蕴含某种高层次文化意象,难以直接运用图像加文献的方法索解、发覆。于是有“心证”法在长期实践中酝酿而生。所谓“心证”,是指学者本人对上述玄奥艰深意象,自具的独到悟解与卓见。这种悟解与卓见不是无根之谈,它来自学者本人深厚的文化学养、尤其得益于中华元典精神的浸润,更来自学者对相关形象序列长期把玩、鉴赏、考察的个人实践。

1. 浸淫众象,酿为心证

学者长期浸淫于某种形象(实物),日夕揣摩参悟,生发凝聚种种诠释,形成对其意涵的特定认知。日后相似的审视过程中,此认知继续“发酵”,酿为“心领神会”的本领,平日“存乎一心”,得机“发为意会”。这种认知本领,无从由图像本身直接求证,也不能同历史文献互证,全凭自心直断,故谓“心证”。“心证”虽属“心断”,却酿自长期观察实践,使其对该图像(实物)之意象的悟解与阐释,往往实现意象与人文契合、历史与逻辑一致,故可称“科学心证”。不少文物考古界前辈,自凭手眼即准确鉴定古器物字画,正是依凭“心证”本领。

2. 博览元典,化为“心证”

吾华无量数先代图像与实物,莫不是先民心血淬炼的人文晶华。那每件故物的具象和意象中,无不默然寄寓各具情怀的先民魂魄。而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,已然凝聚于中华元典文本宝藏。参味体悟元典理念的精华以为导向,藉此去向故物寻觅依稀未逝的家国情怀、先民魂魄。元典理念为导向的形象史学研究,往往可切中肯綮,直达中枢,于最高层次实现意象与人文契合、历史与逻辑一致。藉元典烛照而洞见本源,该是“科学心证”追求的最高境界。

四 三大序列的呈现与相关学养准备

经学界多年耕耘,如今在形象史学、物质文化史研究领域隐然涌现三大学术系列,具有向多序列综合研究发展的趋势。

1. 礼文化形象系列研究

古玉礼器、青铜礼器与乐器、服饰、书仪文书等图像与实物,各具丰厚的礼文化意涵,“礼”是它们共具的历史文化意象,适宜整合为中华礼制文化系列研究。

2. 士文化形象系列研究

文人画、文人书法、琴箏、茶道、酒令等图像与实物,都和士文化相通,富含历史时期士阶层精神生活样态的文化意象,适宜整合为士文化系列研究。

3. 佛道文化形象系列研究

造像、碑记、塔铭、符篆、法器等图像与实物，内置深厚的佛道信仰文化意象，适宜整合为佛道文化系列研究。

以上三个专题的学术意涵有两个共同点，一是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阶级结构、礼法观念、身份意识、文化信仰、风俗习尚等密切相关；二是同中国传统文化大系密切相关。这两点正是一切形象遗物天然蕴含的社会印记和文化印记。中华故物多不胜数、意象纷陈，无一不出自中华故土、无一不创自华夏先民。这两个印记，好比就是一切故物的民族血缘因子和文化血缘因子。

同两大社会印记相关的两大基本事实是，中国古代经历了几种社会生产方式递进的历程，有过四民（士、农、工、商）社会向士族身份性社会、再向庶民非身份性社会的转换。同文化印记相关的基本事实是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系有着元典文化和次生文化之分。元典文化如先秦儒、墨、道、法等诸子之学，汉以后的五经（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）、五礼（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）之学，以至宋、明天理心性之学；佛说诸经、戒定慧三学；老、庄、文、列，以及丹鼎符篆、上清灵宝之学，等等。博大精深的元典文化是支撑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脊梁。科门繁多、姿彩纷呈的次生文化系，汇成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大部类，大都从中华元典主干分孽，再在中华社会沃壤中契合会通、舒枝散叶。形象史学、物质文化史研究属于次生文化研究范畴，中华元典文化是它意象式灵魂的原乡。

面对形象史学明朗而崎岖的前景，正应向着深刻认识古代社会、深入参读元典文化这两大目标，不断提升学养准备。

作者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

收稿日期：2013-02-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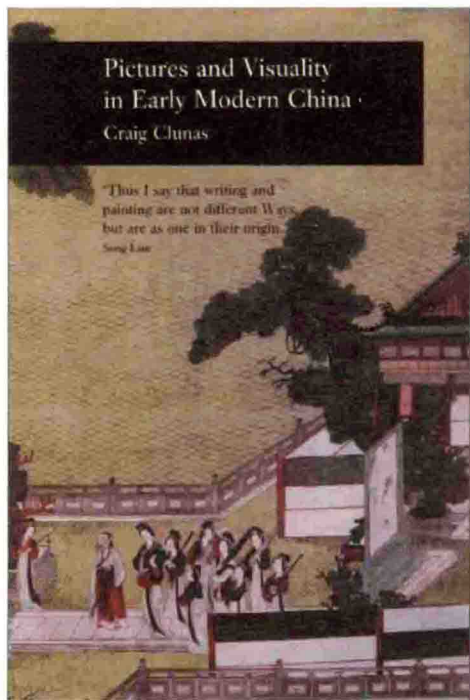
社会文化史中的“观”与视觉性

——以柯律格（Craig Clunas）《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》为中心

汪润

“视觉文化”研究不仅是艺术史的延伸，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之一。它不同于以往的艺术史研究，其研究对象不拘泥于艺术家与绘画名作，而是对广泛的“图像”感兴趣；在研究方法与视角方面，更多地借鉴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，关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与图像之间的关系。当图像与具体的人群活动发生联系，人群在社会文化的地位与关系就被制造、模拟、自我认同并且再生产；整个文化过程交织在一个关键点，即“观”。“观”的行为与意义为什么是一种文化生产？观看行为如何成为“视觉性”的集中表现？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，理解“观”对视觉文化、视觉性的理论有何意义？这些都是本文将要集中探讨的问题。

柯律格（Craig Clunas）的《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》^{〔1〕}（*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*）从艺术史的角度，研究了明代的绘画、工艺美术、书籍等方面的图像，并讨论了“视觉文化”中的视觉性、绘画艺术的现代性等问题。该书不仅是一部艺术史著作，更是吸收了人类学、社会学、跨文化比较研究等多学科方法的社会文化史研究。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，分析该著作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柯氏的研究方法，也有助于社会文化史在艺术领域的发展与融合。本文所探讨的“观”与视觉性也将以柯氏的文本为中心展开讨论。



《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》英文版

〔1〕〔英〕柯律格著，黄晓鹃译：《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1年版。